



穿越时空的诗意和远方 ——影片《红星照耀中国》观后

田水泉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诗意和远方。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视听艺术,除了满足人们娱乐和审美的需要外,还具有记录和复刻时代风貌的功能。正在院线上映的《红星照耀中国》就给当代观众再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面貌,记录了美国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红色革命区域后的亲历见闻。影片以一个外国记者的独特视角,观照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用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如实描绘了那段革命者们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峥嵘岁月,记述了主人公斯诺冲破重重阻碍逃离国民党统治区的苟且生活,毅然决然地前往许多青年向往的红色陕北,采访了并见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坚定信念和革命风采后,饱含激情地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全世界热情推介当时尚鲜为人知的陕北小县城保安,展示了艰苦抗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的诗意青春。

毫无疑问,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映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曲能够感染新时代华夏子孙的史诗赞歌。影片让观众通过大银幕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作为一部纯正的主旋律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跳出了过往一些同类型影片制作成本低廉、人物千人一面、台词空洞生硬、画面简单呆板的拍摄套路,最大限度地用艺术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影片的包装技巧,给观众带来了一次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厚重深刻的思想内涵,颇具实力的演员阵容,相对精良的制作水准,以及影片中时不时闪现出来的饱含丰富想象力的创意和桥段,都为这部红色主旋律影片增添了许多优秀影片的成色和气质,使已经对此类影片有了审美疲劳的观众眼前一亮,在拉近影片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同时,为新时代主旋律类型电影创作作出了积极而有价值的探索。

首先值得点赞的是影片在制作层面体现出的工匠精神。可以看出,影片在摄影与美术方面有较高追求,制作团队在灯光、化妆、服装、道具上都下足了功夫。影片中火车、窑洞等一些室内场景,都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记忆:暖色的灯光打在主角们的脸上,色彩协调的服饰再配上精致的布景在背后衬托,非常有质感和美感;影片整体调色保持了较高水准,既让人感到厚实稳重,又能给观众带来“大片既视感”;电影的配乐都出现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其严肃、压抑、悲壮及欢快的丰富的音乐语言,完美契合了影片的情绪和节奏,让观众有着很强的代入感;枪战场景中的特效使用效果明显,足以看出影片制作者的用心;整部影片在摄影方面表现优异,镜头语言让人很舒服,固定的镜

头会在合适的时间点来回切换,运动的镜头则如流水一般流畅,收放自如,带给观众一种在很多主旋律电影中难以获得的观影“舒适感”。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在当下影视剧拍摄中,许多创作者急功近利,各样媚俗的摄影手法及粗制滥造的布景,不仅拉低了影视作品的质量标准,而且不断挑战着观众的审美底线。作为一部没有过高票房预期的主旋律作品,影片制作团队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值得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的尊重,也给那些经济利益优先、后期偷工减料、敷衍应付观众的制作者打了样。

影片在结构搭建和情节编排上也体现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开头那位哈佛毕业却连唐天佑都不知道的国民党官员,不顾窗外饿殍遍地却只想与妓女寻欢作乐,斯诺与其在火车上的对话极具讽刺意味。寥寥几场戏就让人看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官员对人民漠不关心的态度,与之后出现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部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眼中,国统区的一切都是让人无奈的苟且,红色的陕北才是年轻革命者向往的诗意和远方。这样的情节设计,凸显了影片的思想立意:对待人生态度的差异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征服斯诺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并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制胜法宝。

这部影片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演员的选择。实力演员的倾情加盟和出色表演无疑为影片增添了熠熠星光,也是这部影片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影片中,让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角色是李雪健老师扮演的鲁迅,他精湛的演技使其两分钟不到的戏份却让人过目不忘,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逼真传神的造型及丰富生动的表情,明亮的双眼以及沉稳坚定的语气,完全复活了真实的“鲁迅”形象。可惜的是给李雪健老师的戏份太少了,全片就出现过一次,难免让观众感觉不过瘾。其实不只是李雪健老师扮演的鲁迅,还有李幼斌饰演的陈友仁、蒋雯丽饰演的宋庆龄、果靖霖饰演的蒋介石、王鹏凯饰演的毛泽东、侯祥玲饰演的周恩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为影片增添了光彩,提升了影片的综合品质。客观地讲,本片对当时不同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是相对成功的,基本还原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样貌,没有让观众产生疏离感和违和感。

如何突破主旋律影片固有的创作套路和瓶颈?是许多创作者一直挥之不去的困扰。正缘于此,这部影片在创作层面呈现出来的创新意识更显著,值得赞赏和鼓励。比如“隐形人”马海德医生这个角色的设定,他在片中的若隐若现,对应了他“隐形人”的称号。这个创意很有意思,看得出是导演的精心设计,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只闻其声但

从未露脸的男主老爷。只是导演在将这个很好的创意实施的过程中还显得技巧不够娴熟,看到马海德在影片中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多少会让观众感到有些突兀,需要一定程度的思考并在代入剧情后才能感受导演这么做的真实用意。另一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影片的结尾,斯诺漫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眼里闪着泪光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这个结尾很震撼也很惊艳,配上冲击力十足的片尾曲以及流利的镜头,使得片子在最后极富感染力,给观众带来了极大震撼。这个结尾对影片的主题无疑进行了升华,实属点睛之笔。

当然,影片在创作层面仍有不少未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是影片叙事动力稍显不足,情节推进平缓起伏不大。看完全片,基本上是一个情节毫无转折地连接着下一个情节,是一种过于平实的叙事方式,未能体现更为高超的叙事技巧。第二个是影片中不必要的枝枝蔓蔓较多,详略剪裁稍显不当。一些对故事推动没有太大用处的情节及台词其实可以省去,比如吃火锅的那场戏,没有看出承担了什么叙事或者抒情写意的功能。还有斯诺与毛主席对话时每句台词都要重复一遍的翻译,让故事一下慢了下来,严重影响了影片的节奏。第三个是对斯诺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过于扁平,与其应有的真实身份差距较大。影片中的斯诺不像一个如实报道事实的西方记者,他一出场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粉丝”,过多并过于外露地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徐海东等红军领导的崇拜之情,缺少了作为一名西方新闻记者应有的客观、冷静,更缺少了一个让斯诺从不了解甚至误解国民党口中的“共匪”到接触了解敬佩共产党人的转变过程,使得影片主题表达缺乏张力和说服力。今后主旋律作品创作者应当倍加注意,如何在电影的节奏上做到不拖沓,在价值表达上做到不刻意,在人物塑造上做到真实生动,只有这样,我们的主旋律作品才能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日月点燃烛火,红星照耀中国,山川铸成丰碑,铭刻英雄传说;歌声化成云朵,红星照耀中国。”由女高音歌唱家刘媛媛演唱的《红星照耀中国》主题曲,与影片中那些历史故事和人物群像,带我们再次走进了那段光辉岁月。沟壑交错的红色陕北,艰苦卓绝的革命部队,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新时代的青年人,一定会通过这部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作品,铭记和传承先辈的信仰和初心,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建设更加富强美丽的现代中国,去追寻这一代人应当拥有的诗和远方。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编剧)

《上海堡垒》的“攻”与“守”

程波

电影《上海堡垒》上映后票房和口碑表现都不好,在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科幻电影类型探索及市场培育处在一个上升轨道、人们普遍带有乐观情绪和良好愿景的语境下,较大投资和强力宣传的《上海堡垒》一旦自身在品质上露怯,策略上闪失,那么,客观上确实会让观众、市场和评论界产生很强的失望、丧气,甚至是报复性批评的局面。如同堡垒自身不坚固,甚至漏洞百出,攻不出也守不住,让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在项目阶段,《上海堡垒》的牌面实力看上去不俗:小说原著读者众多,导演有成功的电影和电视剧项目经验,主演(王宝强换成了鹿晗)有市场号召力。不过,牌面实力要转化成口碑和票房,需要一个备战和实战的过程来凝聚、锤炼和检验,纸上谈兵和沙盘推演在创作制作中转换成实战的攻守才行。

说到《上海堡垒》攻与守,电影最表浅的层面就是一个关于攻守的故事。上海堡垒要以“泡防御”对抗德尔塔圣母舰及其派出的“捕食者”的攻击,守住这座城市乃至人类的希望。同时,人类建造了威力巨大的“上海大炮”伺机进攻外星母舰,以攻为守。“仙藤”支撑的城市的能量系统难以攻守兼顾,要想发挥上海大炮的威力就要卸下“泡防御”,把“泡”的能量都凝聚于“炮”。如果这样,城市的能量也会被抽空,上海会陆沉。灰鹰小队的主要任务是操控和带领数量巨大的无人机,在泡防御没有的时候担任空中堡垒,对抗外星母舰和捕食者的攻击。最终,“守”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攻”成。同时,战争的攻守中还有一个爱情攻守的故事,所谓“倾城之恋”:鹿晗守着对舒淇暗恋的情感(当然舒淇对鹿晗也是暗恋情愫的),最终用一种跨越生死的方式表白,“攻”了出去,实现了“对”烦恼的少年维特”的突破和自我成长。

对于科幻电影,一般来说,世界观构建、故事逻辑的创新性与合理性的平衡、细节真实与视听奇观、情感共鸣是不同层面重要的因素。这个有关攻守的故事,采用了怎样的攻守策略,侧重和取舍如何?我们不妨稍微具体地讨论一下:

如果说“守”,电影第一个可以依赖的就是原著小说。江南的原著小说用第一人称追溯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近未来”(2006年到2020年)科幻大背景下的青春成长。小说在世界上构建了人类文明、阿尔法文明、德尔塔文明三者之间类似人、神、魔的关系。人类用阿尔法文明留下的科技建造了“泡”和“炮”,对抗力图毁灭地球的德尔塔文明,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最后阿尔法文明出手相助,人类获胜。这个背景在小说里虽有意识地交代清楚了,但并未正面展开,小说更在意的是主人公江洋在前途未卜的都市里与暗恋对象林澜的爱情纠葛和生活情景。小说里充斥着上海现实的城市地标和场所,有当代感很强的人物,军队也直接用的“解放军”,甚至还有对现实矛盾的触及或戏说。从策略和趣味上说,这部作品都可以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都市言情小说,是典型的“软”

科幻,有一定的范式创新意味。如果采用“服软”的改编策略,那原著小说在类型范式上的创新,乃至一些不错的情感和情节设计就有可能较顺畅自然地移植到电影中,辅之以影像化的手段,或许可以在《疯狂的外星人》这样成功的软科幻喜剧之后,创作出一种范式创新的、有中国特色的软科幻言情电影,而且这部分也是滕华涛导演擅长的。

但是,电影既然选择了由“软”到“硬”的改编策略,选择有勇气地走出安全区去进攻,不论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否明智,那就必须在各个层面相匹配地都得真的“硬”起来才行。

修正和具体化原著的世界观构建是第一步。阿尔法退出,“仙藤”出场,把小说原本就没有具体化、需要丰富的逻辑变得更为“简单化”了,“仙藤”似乎真的成了滕导和其他创作者突破故事瓶颈的“仙”藤了:随意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设定都加到了这一个点上,遇到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那就让仙藤再多一个特性或功能吧。再加上地球人对抗外星人的逻辑,以及诸如为什么外星人执拗地盯着地球的大城市而不迂回地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这个在原著里有交代)这样的具体逻辑都没有设定交代,这样一来导致电影的科幻背景不清晰、逻辑不合理,观众自然难以进入规定情境产生认同感了。

影像化建构人物和场景的细节真实也很重要。《上海堡垒》的战斗场面比较单一,剧情也没有为吸引人的战斗细节提供展现的空间,我们回忆一下《红海行动》或者《流浪地球》,就会自然意识到这一点多重重要。无人机在天上飞,人们在地上追,打外星人具体化为打机甲“捕食者”——“敌人”不是生动的具体的,是复制的傀儡般的。三声“炮”响和“泡”出现漏洞—修复—出现漏洞的节奏也比较单调,“冷冰冰”的对抗建构不起战争情节对观众情感的触动,更何况诸如“明明有更好的武器却不用,而使用手枪冲锋枪等显然无效的武器打机甲”这样的疑惑常常让人出戏。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既然要打仗,儿女情长可以有,但英雄不能气短。用谈恋爱的形象行头和行为逻辑去打仗,不用说俊美的流量小生,即便是诸如灰鹰小队队长和总司令这样形象上很“硬汉”的角色,都显得失真和磨叽。流量明星有基础粉丝和票房号召力,但如果不去靠近角色、塑造角色,观众也不会满意。为什么人们会对鹿晗在电影中的发型发难?发型事小,背后的意识和态度事大。电影在剧情乃至服化道等细节塑造上的随意和偏颇,其后果当然不应由主演一人来“背锅”,是整个创作系统特别是编剧导演这个主控系统出了问题。

硬科幻是有相当的技术门槛的,电影特效技术必须要有相当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在这一点上,《上海堡垒》较之《流浪地球》有明显的差距:一方面,特效预算在电影总预算中比例太低;另一方面,特效的整体一致性不够,刚有几个镜头带感,接下来几个镜头又让人有看静态图片和游戏界面的感觉。据说,原本电影中的“捕食者”

是要延续小说中异形般的“粘液昆虫”造型的,但为了好做就变成机甲造型了。不要说跨越门槛了,电影在技术上还存在一些明显失误:主角剪了怕粉丝认不出来的让人出戏的发型、后期配音时常对不上的嘴型、战斗场面中杂乱无章的队形,特效镜头中不在一个图层的算法模型。这样“技术失误”,着实会让观众和评论者因为“技术原因”不悦。

“守”不应墨守,但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为“攻”提供支撑和契机。《上海堡垒》的资源使用方式使其在“科幻外衣的青春爱情电影”和“爱情辅助点缀下的太空歌剧”之间犹疑摇摆,进而使其缺乏“攻”的气质,探索的方向不明且缺乏力量,所谓“失量小”:不是攻守不平衡的问题,更谈不上以守为攻或以攻为守,是攻不下守不住的问题。

据说电影筹备很久,剧本几易其稿,主创团队工作十分认真。被称为“烂片”,制片方和主创肯定觉得冤枉或者命不好。这让人不免联想起几年前一部由著名导演监制,著名作转型做导演的作品口碑和票房双“扑街”的情况。如果美学和价值观上出现了问题,方向错了,所谓的“认真”就不是艺术上的真认真,只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拍电影不易”行活层面上的“认真”而已,其表面的认真中隐藏着很多随意、妥协和麻木。小说原作的选择,电影的改编策略,进而到电影的故事构架和美学追求,电影在这些很根本的位置上出了问题,该用心处未用心,细枝末节上的认真也可能就是徒劳。如果电影仅仅是局部的片段的,那么面对制作精良的几个镜头,不光是制片方,观众也会发出“这是烂片?”的疑问,但电影是整体,是故事,是人情。面对市场,电影要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进攻,且要攻心为上。

由《上海堡垒》我们也会想到中国当代电影的攻守问题。中国当代电影特别是重工工业化的科幻电影,不应该因一部作品的成功就盲目乐观,当然也不能被一部作品的失败淹没在丧气灰心之中。路要一步步走,要守住故事、逻辑常识,乃至技术指标的底线,才有可能在市场乃至与好莱坞的竞争中立住脚。《上海堡垒》并非一无是处,其隐含着一定的创新的契机和意识。重工业化、类型融合、科幻电影范式创新,这些都涉及创意形式和内容上的相互关系,以及创意和手艺结合的问题。要让真正接地气、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更普遍共鸣感的东西成为核心竞争力,科幻世界观可以架空,但思维方式、故事逻辑乃至人文情感不能架空,不是标签化“命名”一次中国或者本土城市那么简单。这是中国电影要持续探索的方向,是要有进攻勇气的。进攻就是会有牺牲的,前两年的《长城》探索方向很有价值,但文本出了问题。《上海堡垒》试错代价虽然有些大,但能为后来者带来启发也就不算白牺牲。真诚踏实地练好内功,才不会自毁长城,堡垒也才不会从内部被攻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戏剧与影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